

青年恩格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契机及其启示

姜海波

(黑龙江大学哲学院, 黑龙江哈尔滨, 150080)

摘要: 国民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条件之一。以往的研究对于恩格斯率先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契机及其意义阐释得尚不够充分。文章在回顾以往理论成果的基础上, 以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为中心, 通过对恩格斯青年时期求学、经商和政论活动的文本进行分析, 阐明恩格斯在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获得了汇通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和国民经济学的灵感。只有经历了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契机, 恩格斯才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德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 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 并意识到哲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转换的重要性, 进而发现了推动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

关键词: 恩格斯; 国民经济学; 李嘉图社会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

中图分类号: 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5-0079-08

恩格斯“指引”了马克思早期哲学思想发展过程中的“经济学转向”是学界共识, 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至少4次引用了这个“天才大纲”。可以说, 在经济学研究路径及其引申的哲学问题域中, 青年恩格斯领先于马克思。然而, 恩格斯研究经济学的动机和契机是什么? 马克思所谓的“另一条道路”又说明了什么? 如果“经济学转向”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必要条件, 如果经济学研究可以明显地区分实践哲学、政治哲学的分析框架, 如果经济学视角推动了哲学范式的转换, 如果国民经济学批判是变革旧哲学或思辨哲学的方法论, 那么, 恩格斯率先研究和应用国民经济学则说明, 他不仅是马克思思想的阐释者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及者, 而且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研究中可信和有效的参照系。既然我们可以依据马克思的著述来理解恩格斯, 反之, 我们同样可以考虑恩格斯提供给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路径的起源。因此, 回顾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历程, 对于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质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恩格斯转向国民经济学的传统观点

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以下简称MEGA2)已经出版了青年恩格斯1844年6月之前的文章、论著、书信和笔记。1833年12月至1842年10月间, 恩格斯先在不来梅学习经商, 而后在柏林服兵役。1842年11月至1844年6月, 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撰写了一系列短文。由于《集权和自由》《柏林杂记》等五篇文章尚不能确定是恩格斯的著述, 故此MEGA2并未收录。于是, 在文献更新的同时, 恩格斯早期思想的阐释体系也需更新, 即清晰地梳理出青年恩

收稿日期: 2024-01-15; 修回日期: 2024-04-01

作者简介: 姜海波, 男, 黑龙江哈尔滨人, 黑龙江大学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联系邮箱: jianghb923@163.com

格斯思想发展的脉络。

简言之,从1837年恩格斯的中学肄业证书呈现的知识体系,一直到他1841年秋赴柏林服兵役,人们迄今未能发现任何有关恩格斯研究和阅读经济学著作的直接证据或线索(这里不着意区分“国民”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此时的恩格斯关注哲学和文学,他对小说、诗歌和戏剧都有着深入和广泛的阅读,并形成了很多不俗的见解。恩格斯在柏林服兵役期间,旁听了柏林大学的课程。尽管黑格尔和谢林的哲学吸引着恩格斯,恩格斯也因批判谢林哲学而在德国思想界脱颖而出,但恩格斯的有关文本也可以证明,他已经逐渐摆脱哲学和文学的视角,转而关注现实的社会问题。

从1842年12月到达曼彻斯特至1844年8月回到德国,在这不到两年的时间里,恩格斯的哲学观点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变化。其中,国民经济学研究是恩格斯理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它的主旨与方法成为恩格斯研究社会问题的理论武器。对此,几乎所有的恩格斯传记作品都有涉及。

古斯塔夫·迈耶尔在其著名的《恩格斯传》中指出,恩格斯的新世界观形成是受赫斯的影响^[1]。赫斯曾谈到他与恩格斯在《莱茵报》编辑部的一次谈话,还称这次谈话使恩格斯转向了共产主义,但这不足以说明恩格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动机。实际上,赫斯和鲍威尔、梅因等人一道,都在《莱茵报》撰文论述英国时局,他们都发现英国存在社会冲突,但其解决问题的主张却截然不同。一些人主张不危及资产阶级的地位来维护无产阶级的物质利益,另一些人则力主改变财产关系,而且认为共产主义在英国和德国的实践途径或道路也不同。恩格斯当然注意到了这些分歧的观点,他本人执笔的通讯也依赖这些作者的经验观察以及他们的共识。但是,“谈话”可以让恩格斯加速转向哲学共产主义,却不能澄清恩格斯在缺乏英国生活经历的条件下去研究经济学的动机。或者说,国民经济学研究是转向共产主义的基础,抑或转向共产主义是国民经济学研究的前提。这在迈耶尔的记述中还没有明确说明。梅林在《马克思传》中提出,马克思是通过“法国大革命”也就是从政治和历史走向共产主义的,而恩格斯是通过“英国工业”走向实证从而接近新的历史观的。梅林并不确定地说:“恩格斯还由于职业的缘故首先把注意力放在经济关系方面。”^{[2](127)}他特意强调,经济学是与德国古典哲学决战的领域,“恩格斯是给予者,而马克思是承受者”^{[2](128)}。可见,早期的传记作品已经揭示出国民经济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历程中的重要节点。

著名的恩格斯传记作家列·伊利切夫认为,恩格斯在英国居留期间,形成了关于“物质生产和经济关系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的思想,并推动他本人去批判国民经济学,而《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就是最初的也是最重大的理论成果。他还认为,恩格斯是“第一个而且巧妙地应用辩证方法来剖析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3](42)}的人,“恩格斯通过对经济规律的唯物主义阐释和对经济规律的历史性质的着重说明,发现了一条摆脱资本主义矛盾‘迷魂阵’的唯一可行的现实出路。这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发现”^{[3](44)}。同样,格姆科夫认为“经济条件和经济利益对于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是引起恩格斯注意并推动他展开研究的根本性问题^[4]。列昂节夫指出,恩格斯除亲身考察外,还广泛研究官方资料,了解工人阶级的情况,他发现“贫穷的劳动者”是英国经济学家对工人阶级的称呼,“与此同时,恩格斯系统地研究了英国政治经济学”^[5]。这样,国民经济学在理解历史、政治、社会问题及在历史唯物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也被进一步强化。

在我国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著述中,恩格斯1842至1844年间的思想转变都是重要的内容,恩格斯研究国民经济学、阅读斯密和李嘉图等人的著作是作为事实来陈述的。其中,黄楠森等主编的八卷本《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的解释具有代表性,即恩格斯一是意识到经济因素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二是德法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经济状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因此恩格斯为了克服这些缺陷而倾心研究国民经济学^[6]。

总之,对于青年恩格斯为什么要研究国民经济学,以往的结论可以简要归结为两个方面:一是

因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的激励和影响。如 MEGA2 给出的回答是：“由于曾受到那些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多方面批判的英国和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及共产主义者的激励。”^[7]图赫舍雷尔认为，恩格斯的出发点与当时的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是一样的，其中包括蒲鲁东及其著作《什么是财产？》。这一点也可以从恩格斯当时就推荐把蒲鲁东的著作译成英文这一事实中得到说明。我国有学者认为，恩格斯“是在蒲鲁东和赫斯的影响下才开始研究经济学的”^{[8](173)}。简言之，德国的“哲学共产主义的基本缺点”是恩格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动因。二是因为恩格斯发现了经济关系的基础和决定作用，这是恩格斯从亲身的求学经历、经商经历和政论经历中得到的创造性认识。

卢森贝、马雷什、维戈茨基等经济学家均未注意到这种转向的哲学意义，曼德尔甚至认为，恩格斯在经济学方面没有新贡献，而是马克思通过隐藏在黑格尔著作中的斯密发现了黑格尔的缺陷，并将经济学哲学化。只有图赫舍雷尔写道：“马克思越是接近历史唯物主义，从而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越是深入。”^{[9](192)}反过来，我们也可以说，马克思越是深入研究经济学，他就越接近历史唯物主义，或者这两个向度缺一不可。这个说法对于恩格斯也完全适用。那么，问题的提法中就增加了一层含义，即青年恩格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契机彰显出哲学范式或历史理解范式的深刻转换，如何总体性地消解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和英国国民经济学的缺陷，并将三者稳定地结构在一种理论体系中。

二、恩格斯初涉国民经济学时的唯物主义结论

1842 年 11 月至 1844 年 8 月，恩格斯居住在曼彻斯特。这段生活经历对于恩格斯后来的社会、政治和哲学观点的形成，特别是促使他转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立场影响极其深远。恩格斯研究国民经济学的动机和契机就含蓄地保留在他的早期著述中。

实际上，恩格斯在迁居英国以前就开始研究并熟悉英国状况，这在恩格斯给卢格的信中以及恩格斯自己的文章中都有所体现^{[10](301-302)}。根据现在掌握的文献，恩格斯在《〈刑法报〉的停刊》一文中首次分析了英国的情况。可是，恩格斯“对英国的情况潜心研究一段时间”依据的是哪些具体资料尚不能确定。恩格斯的《一个旁听生的日记》显示，他在旁听柏林大学的课程时，通过冯·亨宁了解了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的理论成果，还了解到哈斯基森于 1824 年至 1827 年担任英国政府大臣期间将斯密的原理作为改革实践的基础。这是恩格斯首次提及经济学家的观点，他写道：

普鲁士同其他许多国家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财政制度是完全建立在近代国民经济科学基础上的，到目前为止，只有它一个国家敢于把亚当·斯密及其继承者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实践。^{[11](428)}

从该文随后所做的评论来看，恩格斯此时尚未洞悉国民经济学的真正价值，相反，他强调的是“普鲁士的福气就在于理论、科学和精神的发展”^{[11](429)}。也就是说，普鲁士是由“目的”和“精神”形成的国家，相关的国家制度也是从“思维”中生长出来的，因而不能放弃普鲁士的“精神”和德国式的“自由”。这样，国民经济学与恩格斯正在建构的理论体系擦肩而过。1908 年，考茨基在题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生平、工作、著作》的长文中提到，当恩格斯 1842 年到达曼彻斯特时，他在经济和哲学方面已有所训练。他的记述是可靠的，他还对于没能将与恩格斯的谈话记录下来而感到遗憾。恩格斯的文本证实了考茨基的说法。

在居留曼彻斯特期间，恩格斯通过大量阅读官方资料，探寻工人贫困的原因，设想消除贫困的办法。然而他发现，英国的统治者藐视革命，并宣扬革命对于下层人民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只会有更多的失业、贫困和饥饿。同时，恩格斯也发现，英国人的思维方式与德国人的完全不同，“有一个问题，

在德国已经是不言而喻的,而对于一个顽固的不列颠人,却无论如何也讲不明白,那就是所谓的物质利益在历史上从来不可能作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出现,而总是有意无意地为引导着历史进步方向的原则服务”^{[10](407-408)}。这就是德国的“原则”和英国的“物质利益”之间的矛盾。可以推测,恩格斯势必要解释和解决这个矛盾,因而有必要深入研究国民经济学。恩格斯经历了托利党、辉格党和宪章派之间的斗争,它们分别代表土地贵族和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商人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利益。对于无产阶级而言,民主和自由是纯粹形式上的权利,法律杂乱无章且司法机关从不遵守,法学蜕化为诡辩术,经贿选的议会与贫苦大众无关,政府无视社会舆论等。这些现象显然与英国的贸易、航运、工业等经济现实直接相关。由于恩格斯处于“反谷物法”运动的中心,他在了解贸易保护制度、商业停滞、机器生产、佃租等经济学问题后,很快就认识到:阶级冲突的基础不是思辨的精神原则,而是有其物质的和经济的根源。于是,恩格斯在到达英国后所写的文章就已经开始阐述英国社会各阶级的物质利益和物质冲突,并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即“这个革命在英国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正像英国发生的一切事件一样,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11](411-412)}。此时恩格斯的见解已经同他从前所持的见解大不相同了,而新的见解只能奠基在国民经济学基础之上,“原则”决定革命的看法已经被国民经济学引申的结论置换了。

《伦敦来信》表明,恩格斯在1843年5月就了解了斯密的“自由贸易”理论和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荒谬结论”,考察过“教授和实践政治家是怎么对待国民经济学这门科学的”,并能够揭示出其中的要害所在。恩格斯在《伦敦来信 一》中写道:

英国是国民经济学的故乡,但是在教授和实践政治家中间这门科学的水平如何呢?亚当·斯密的“自由贸易”竟被卷入马尔萨斯人口论的荒谬结论。“自由贸易”只是为旧的垄断制度制造了一个新的、更文明的形式,这种形式在当今的托利党人中有自己的代表;它卓有成效地同马尔萨斯的胡说进行了斗争,但最终重又得出马尔萨斯的结论。^{[10](424-425)}

这里还需提及恩格斯研究国民经济学所得到的重要启示。在《伦敦来信 三》中,恩格斯写道:

在他们的讲演者(说教者)当中,我认为曼彻斯特的瓦茨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个卓越的人物,他才气横溢,写过几本关于上帝的存在和国民经济学方面的小册子。这些讲演者有非常出色的推理方法:一切都从经验和可证实的或直观的事实出发,但同时又富有原则性的阐发,以致要想在他们选定的立足点上和他们斗争,就很困难了。不过,谁想选择另一领域,那他们就当面嘲笑他。^{[10](432)}

引文中的“一切问题都从经验和可靠的事实出发”是值得注意的,它表明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并非来自“神启”,也不能建立在人类的道德和伦理关系上,而是要将抽象的人推进到经验的、现实的无产阶级。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框架就因国民经济学的介入而被挤出理论舞台的中心,而关于共产主义的论证都要以经过慎重甄选的事实为依据。正像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的副标题所昭示的那样,是“根据亲身观察和可靠材料”,任何法国式的对未来社会的凭空想象既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必要的;任何费尔巴哈式的理想化道德说教都无法生成无产阶级革命的真实成果;任何黑格尔式的精神原则都必须基于现实的物质利益。这就是恩格斯研究国民经济学之后所得出的唯物主义结论。

三、恩格斯对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高度认可

自从青年恩格斯踏上不列颠国土后,他在之前直接或间接提出而又未能及时弄清楚的许多理论问题都需要从国民经济学的找寻答案。恩格斯青年时期的理论道路也是充满了契机和阶段性的,他也要

从批判性地吸收现有的理论成果开始，研究国民经济学也不例外，特别是要从恩格斯的摘录笔记中寻找新的线索。

刊载于MEGA2第Ⅳ部分第2卷中的《阿·艾利生〈人口原理及其和人类幸福的关系〉一书的摘录》是目前唯一保存下来的青年恩格斯经济学研究的读书笔记。但是，恩格斯本人也没有标明摘录的时间，现存的摘录也不完整。摘录中的内容被恩格斯运用到《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他称艾利生是“最有才智的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并且转述了艾利生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恩格斯在摘录中明确写道：“第二章论述大城市的穷人，这一章非常重要，在利用时应尽可能再一次参照它。”^[12]这表明，艾利生著作中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实际材料，英国当时劳动者赤贫的原因及其解决措施引起了恩格斯的高度关注。由此可见，阅读和摘录国民经济学家著述是为了从理论上说明英国社会的真实矛盾。

实际上，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直接用到的著作就很多，如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和赋税原理》、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等等。此外，还有布雷的《对待劳动的不公正现象及其解决办法，或强权时代和公正时代》、汤普森的《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瓦茨的《政治经济学家的事实和臆想》、卡莱尔的《宪章运动》、威德的《中等阶级和工人阶级的历史》，以及尤尔的《工厂哲学：或论大不列颠工厂制度的科学、道德和商业的经济》。他还指出要“部分地参看傅立叶的著作”^{[10](462)}，即《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与《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等。这些经济学思想资源，可以按其作者对待“私有制”的态度及恩格斯本人的理论取向分为两类：一类是批判性思想资源，即这部分经济学著作将“私有制”作为天然合理的前提，恩格斯对此也持批判的立场，斯密、李嘉图、马尔萨斯等人的著作均属此类；另一类是建构性思想资源，即这部分经济学家主张消除私有制及其产生的社会弊端，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李嘉图社会主义者，恩格斯对此采取借鉴和正面阐发的立场，“我要提出的观点是：恩格斯在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获得了汇通德国哲学、法国社会主义思潮和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灵感，更为重要的是，恩格斯从中发现了推动历史进程的根本力量”。

在此，笔者还不得不做些简要回顾。早在不来梅时期，恩格斯就参与到“青年德意志运动”中，在离开柏林之前，恩格斯研读了赫斯的《共产主义原则的统治形式》一文，由此了解到法国的社会主义思想。1843年，恩格斯阅读了《法郎吉》《伦敦法郎吉》和《独立评论》等刊物，熟习了傅立叶关于生产者协作的思想。他不满傅立叶回避国民经济学及否定国民经济学的科学意义。恩格斯认识到，圣西门大力主张社会改革却是“一颗闪烁的流星”，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特别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闪烁着天才的光芒。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第一次接触到欧文派社会主义者，但是，他认为其全部学说都笼罩在不可理解的神秘主义云雾中，以致他大失所望。通过《伦敦来信》，我们知道恩格斯阅读了施泰因的《现代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开始细致思考社会问题，并将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方面，可他对该著作的评价却是“内容贫乏”。恩格斯不仅批判地吸收和创造性地把握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还钻研了德国的社会主义思想。他认为，魏特林创办的杂志《年轻一代》“虽然只是写给工人看的，文章也是由工人写的，但从一开始就胜过法国社会主义者办的大部分刊物，甚至胜过卡贝老爹办的《人民报》”^{[10](487)}。他还认为，号称“第一个德国共产主义理论家和鼓动家”的魏特林把共产主义归结为基督教学说是不科学的。这些社会主义文献中的空想性质是恩格斯不能接受的，通过社会主义文献，恩格斯意识到国民经济学在私有制问题上的形而上学。

但是，将社会主义和经济学相结合的研究成果却得到了恩格斯的肯定。他说：“到处是不彻底和虚伪，可是社会主义者以及部分宪章派的有说服力的经济论文，却被轻蔑地扔掉，这些论文只有在下

层等级中才能找到读者。”^[10](424-425)] 恩格斯在这里所说的“有说服力的经济论文”可以在《资本论》第二卷的序言中找到答案,即埃德蒙兹、汤普森、霍吉斯金等人的著述^[13]。他们在融合古典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思想方面具有独创性,被称为李嘉图社会主义者。

第一,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强调了生产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即“生产”是经济生活的最重要因素,而且李嘉图社会主义者都强调生产对于消费和分配的绝对优先性。汤普森指出:“真正积累起来的财富,就它的重要和对于人类幸福的影响来说,和无论处于什么文明情况的同一社会的生产力比较,甚至于和那个社会的即使是几年的真正消费量比较都是微不足道的了。所以立法者和政治经济学家应该特别注意‘生产力’和它将来的自由发展,而不是象以前那样只是注意惹人注目的积累起来的财富。”^[14] 霍吉斯金给政治经济学所下的定义是:“政治经济学是有关影响劳动生产力的、以及调节并决定一切劳动产品的分配的全部条件或规律的科学。”^{①[15]}他认为,在劳动创造财富这个原理的基础上,人们就可以厘清野蛮人部落的生产力和文明社会的生产力的差别。第二,通过生产力,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发现了资本和劳动的矛盾。汤普森长期生活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较为发达的城市,他看到了产业革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繁荣景象,也注意到了产生革命引发的社会问题,比如工人受到机器的排挤而失业,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为恶劣,乃至生产过剩和经济危机。在霍吉斯金看来,资本没有任何生产力,所谓“资本生产力”实际上是劳动的生产力。生产力和劳动热忱之间的矛盾会随着资本主义的剥削不断加深,直到没有任何劳动积极性,那时,生产力也就达到它的界限不再发展,人类的需要也就不会得到满足了。第三,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突出了知识对于提高生产力的作用。汤普森提到了知识与生产力的关系,他强调知识、技术在生产中的重要作用,同时也指出由于不合理的分配导致的知识与生产力的矛盾。

将这些观点与恩格斯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的论述加以对比,我们会发现,恩格斯在反驳马尔萨斯关于生产力、科学技术、人口、消费、商业危机等问题时的观点与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观点高度契合,在此不一一列举。因此,尽管恩格斯的摘录笔记没有被保存下来,但几乎可以断定,恩格斯通过阅读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著述,发现了生产力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源动力。恩格斯本人也曾说过:“在有关实践、有关影响现存社会的实际状况方面所做的一切,我们发现,英国社会主义者远远超过了我们,我们要做的就很少了。我顺便提一下,我接触了一些英国社会主义者,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我都同意他们的看法。”^[10](493-494)]笔者认为,恩格斯在此是特指李嘉图社会主义者。

四、恩格斯对国民经济学、哲学和社会主义理论的首次创造性综合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作为青年恩格斯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无疑是当时德国理论界的一部开拓性著作,其中已经显示出了他对国民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这三方面理论资源的批判性加工与整合。他对三者的有机整合是建立在应用新的辩证法的基础上的,即生产力和劳动引发的经济事实对于解释和说明历史具有优先性。由此,恩格斯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在旅英期间合乎逻辑地转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其中,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对恩格斯的影响不容忽视。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不仅与德国古典哲学的体系化形式存在差异,而且与其他经济学家的观点和思路也有很大不同。1843年秋,恩格斯就开始将私有制视为社会灾难的主要原因,并逐渐将研究的焦点集中到私有制上。此时的恩格斯必然试图从理论上清理私有制,而对私有制的研究必须通过英国的国民经济学来把握,这个研究过程就是恩格斯独立逼近共产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过程。在恩格斯看来,国民经济学把私有制看作是天然合理的、无需反思的理论前提,把劳动看作是财富的源泉,因对私有制无能为力,它无法回答和澄清私有制在历史上的起源和演变问题。以傅立叶、圣西门和

欧文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虽然揭示了私有制的弊端并提出了自由劳动理论，却回避了经济学。或者说，传统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的主要缺点是对历史、国民经济学和实践的无知。能够有机联结社会主义与国民经济学这两大领域的理论成果，并直接提供研究思路和方法的正是德国哲学。所以，《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在措辞和术语方面几乎直接采用黑格尔特有的“矛盾”表述方式。在1871年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恩格斯坦言是以“黑格尔的风格写的”，那么在何种意义上，国民经济学为超越黑格尔哲学提供了理论支撑呢？

众所周知，恩格斯在赴英国前就已经研究过黑格尔哲学，他首先研读的是《历史哲学》，还试图将民主主义立场同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结合起来得出政治结论。恩格斯又是青年黑格尔派中反对和批判谢林哲学的先锋和重要代表，但是这场理论斗争是在哲学和政治的话语体系中展开的，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充当了人道主义和革命志向的哲学依据。但是到了英国以后，恩格斯发现，德国哲学研究方法不适应英国的形势。恩格斯在和普通工人交往后发现，直接的实践对历史观的真实性和有效性提出了疑问。辩证法的本质使恩格斯清楚地认识到，历史哲学无法通过自身来实现。恩格斯也注意到，黑格尔的“政治观点、他的以英国为背景阐述的国家学说，明显地带有复辟王朝时期的烙印，他同样无法理解七月革命的世界历史必然性”^{[11](338)}。恩格斯对英国政党和议会的深入了解，对英、法、德这三个国家的国家机构的研究，特别是从经济学视角的考察，使他突破了黑格尔国家学说的框架，从而在理解国家的本质、政党纷争、社会革命的必要性等方面前进了一大步。

在以经济地位为事实标准区分了英国主要的政治力量、联系工人生活实际和英国社会状况以后，恩格斯发现无产阶级将是社会革命的主导力量。这体现出他运用辩证法的思维方式来研究英国的特点。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从私有制引发的对立或矛盾出发来理解社会的各种现象，追溯社会革命的过程。这种切入理论的方式本身就是哲学方法论。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方式同样适用于国民经济学，即国民经济学基于未经证实的前提，它也是神秘的和有缺陷的。而恩格斯的德国哲学的思维方式和他对英国产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直观体验使他形成了独特的理论。比较而言，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对私有制或私有财产做出了最强有力的捍卫，但是他的论述与国民经济学相比就黯然失色了，而恩格斯对于英国社会矛盾的观点就不再是基于“哲学范畴”的。可以说，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恩格斯对待黑格尔哲学的态度是独立的，更是独特的。

1885年，恩格斯在回顾自己青年时期的思想经历时明确指出：

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产生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史的基础。马克思不仅得出同样的看法，并且在《德法年鉴》（1844年）里已经把这些看法概括成如下的意思：决不是国家制约和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制约和决定国家，因而应该从经济关系及其发展中来解释政治及其历史，而不是相反。^[16]

在这里，恩格斯明确谈到了对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理解，可以说，仅仅通过批判现存的事物还不能实现社会革命，将国民经济学纳入体系化的分析框架同时也是哲学方法论的变革，这种研究范式的转换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特征。

1845年以后，国民经济学研究主题在恩格斯的著述中似乎突然消失了，直到马克思逝世以后，恩格斯继续编辑出版《资本论》第二、三卷才得以继续。其原因可以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关系中找到答案。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使马克思认识到，恩格斯是具有开阔眼界的、卓越的思想家，并且马克思肯定这部著作“已经表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某些一般原则”^[17]。卡弗甚至认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对马克思产生了巨大冲击”，“马克思对恩格斯的文章所做的摘要以若干压缩

的短语预示了他终生工作的方向”^[18]。在恩格斯的启示下,马克思才走上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道路,并且越走越远。这个启示的核心在于:将私有制和现代资本主义工厂制度的弊端归因于物质生产的基础性地位,以及生产力的客观推动性质,由此逼近历史唯物主义。这里仅以恩格斯1859年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所写的书评中的一段话作为结语,它既彰显了这条理论道路无可比拟的重要性,又体现了恩格斯的伟大贡献。

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归根到底是阶级和阶级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并且作为物出现。诚然,这个或那个经济学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而马克思第一次揭示出它对于整个经济学的意义,从而使最难的问题变得如此简单明了,甚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现在也能理解了。^[19]

总之,只有经历了解决英国社会问题的契机,恩格斯才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德国人特有的思维方式,转而去研究国民经济学。也只有深入研究了国民经济学,恩格斯才意识到哲学方法论和研究范式的转换。其中,李嘉图社会主义者对恩格斯的影响极其重要,这一点在以往的研究中几乎没有谈到。在恩格斯的“启示”下,马克思写下了《布鲁塞尔笔记》和《曼彻斯特笔记》,并坚定地完成了对李嘉图社会主义者的超越。

注释:

- ① 译文有修改,霍吉斯金这部著作的译者将“productive power”一词几乎全部译作“生产能力”,为了论述方便,本文改译为“生产力”。

参考文献:

- [1] 古斯塔夫·梅尔. 恩格斯传[M]. 郭大力, 编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50: 21.
- [2] 弗·梅林. 马克思传: 上[M]. 樊集,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2.
- [3] 列·伊利切夫, 等.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M]. 程代熙, 刘丕坤, 黄常需, 等译校.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 [4] 海因里希·格姆科夫, 等. 恩格斯传[M]. 易廷镇, 侯焕良,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0: 62.
- [5] 列·阿·列昂节夫. 恩格斯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M]. 张仲朴, 等译.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84: 20.
- [6] 黄楠森, 庄福龄, 林利.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第一卷[M]. 修订本. 北京: 北京出版社, 1999: 266.
- [7] 马克思主义研究资料: 第11卷[M].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5: 170.
- [8] 张一兵, 周嘉昕. 资本主义理解史: 第一卷[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173.
- [9] 图赫舍雷尔. 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形成和发展(1843—1858)[M]. 马经青, 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1: 192.
-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2.
- [1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5.
- [12] 马列主义研究资料: 第1期[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9.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6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8.
- [14] 威廉·汤普逊. 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M]. 何慕李,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454.
- [15] 托马斯·霍吉斯金. 通俗政治经济学[M]. 王铁生,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17.
- [1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232.
- [1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19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3: 259.
- [18] 特雷尔·卡弗. 马克思与恩格斯: 学术思想关系[M]. 姜海波, 王贵贤, 等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8: 36.
- [19]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604.

(下转第206页)